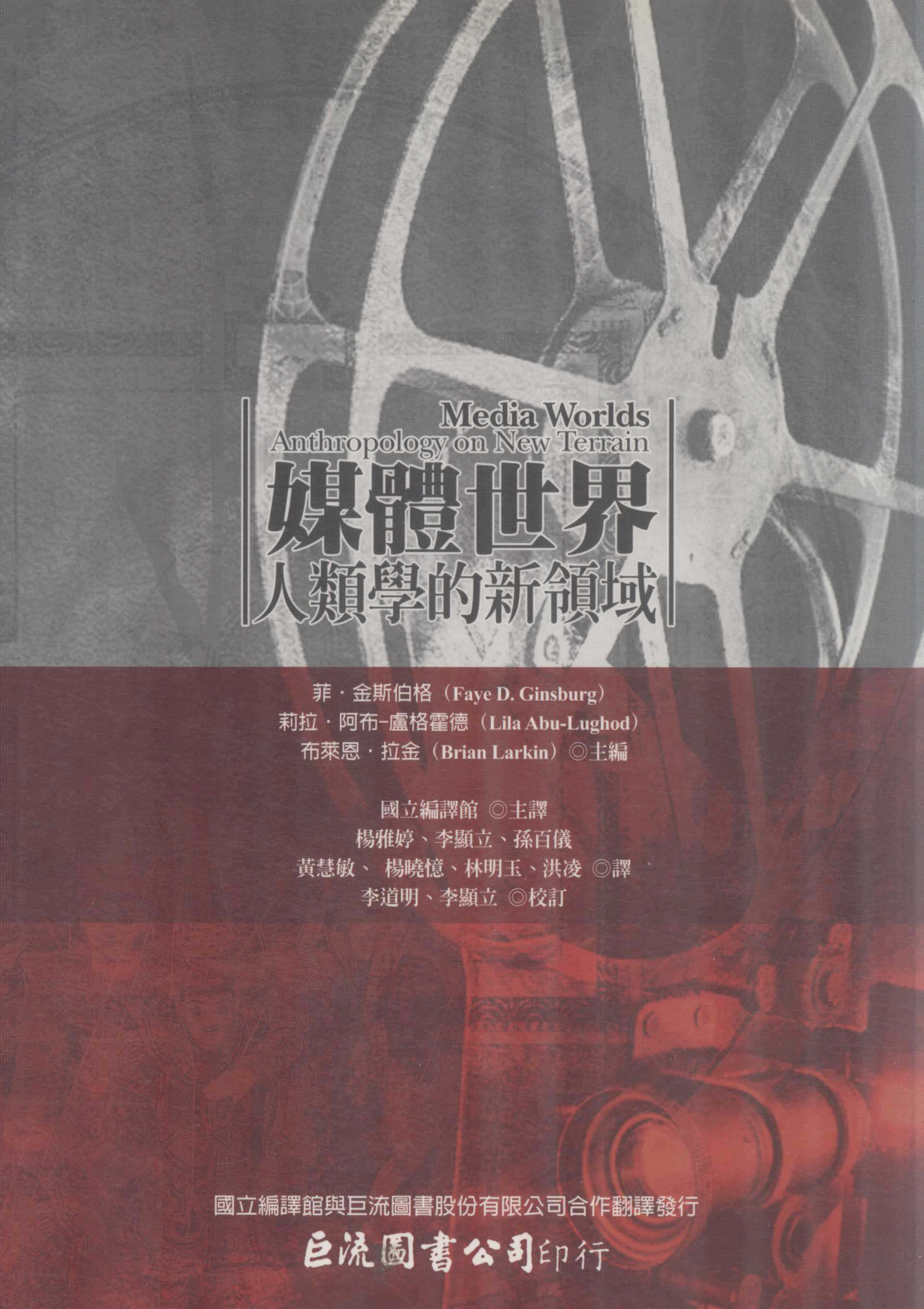




Media Worlds
Anthropology on New Terrain

媒體世界

人類學的新領域

菲·金斯伯格 (Faye D. Ginsburg)

莉拉·阿布-盧格霍德 (Lila Abu-Lughod)

布萊恩·拉金 (Brian Larkin) ◎主編

國立編譯館 ◎主譯

楊雅婷、李顯立、孫百儀

黃慧敏、楊曉憶、林明玉、洪凌 ◎譯

李道明、李顯立 ◎校訂

國立編譯館與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翻譯發行

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Media Worlds
Anthropology on New Terrain

媒體世界

人類學的新領域

菲·金斯伯格 (Faye D. Ginsburg)
莉拉·阿布-盧格霍德 (Lila Abu-Lughod)
布萊恩·拉金 (Brian Larkin) ◎主編

國立編譯館 ◎主譯
楊雅婷、李顯立、孫百儀
黃慧敏、楊曉憶、林明玉、洪凌 ◎譯
李道明、李顯立 ◎校訂

國立編譯館與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翻譯發行
2008 年 10 月出版

媒體世界：人類學的新領域 / 菲·金斯伯格 (Faye D. Ginsburg), 莉拉·阿布·盧格霍德 (Lila Abu-Lughod), 布萊恩·拉金 (Brian Larkin) 主編; 國立編譯館主譯; 楊雅婷等譯. -- 初版. -- 臺北市: 巨流, 編譯館, 2008, 10面; 公分

含索引

譯自: Media worlds: anthropology on new terrain

ISBN : 978-957-732-315-6 (平裝)

1. 大眾傳播 2. 媒體文化 3. 跨文化傳播 4. 跨文化研究

541.83

97019224

媒體世界：人類學的新領域

原著: Media Worlds: Anthropology on New Terrain

主編: Faye D. Ginsburg, Lila Abu-Lughod, Brian Larkin

譯者: 國立編譯館主譯 / 楊雅婷、李顯立、孫百儀、黃慧敏、楊曉憶、林明玉、洪凌 譯

發行人: 楊曉華

責任編輯: 邱仕弘

封面設計: 許勝雄

出版者: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與國立編譯館合作翻譯出版

地址: 11605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集英樓 2 樓

電話: (02) 86613898

傳真: (02) 86615465

帳號: 01002323

戶名: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E-MAIL : chuliu@ms13.hinet.net

<http://www.liwen.com.tw>

總經銷: 麗文文化事業機構

地址: 80252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 57 號 2 樓之 2

電話: (07) 2265267

傳真: (07) 2264697

法律顧問: 林廷隆律師

電話: (02) 29658212

出版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 1045 號

ISBN : 978-957-732-315-6

GPN : 1009702833

2008 年 10 月初版一刷

定價 55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 請寄回更換

著作財產權人: 國立編譯館

<http://www.nict.gov.tw>

地址: 10644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79 號

*本書保留所有權利, 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 須徵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書面授權。

請洽: 國立編譯館世界學術著作翻譯委員會

電話: (02) 3325558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地址: 104 台北市松江路 209 號一樓

電話: (02) 2518-0207 (代表號)

國家網路書店: <http://www.govbooks.com.tw>

獻給 *Annie*、*Sinéad*、*Adrian*、*Justine* 以及 *Samantha*
他們將比我們擁有更豐厚的媒體世界。

人們常說，（媒體已經）改變我們的世界。人們也用同樣的方式，
提及這個或那個新科技：像是蒸汽引擎、汽車、原子彈，
這些新科技創造——「帶出」——了
一個新世界、一個新社會、一頁新的歷史。
我們大多瞭解這樣說通常意味著什麼。
但最困難的是：我們是如此習於這種日常討論中的籠統說法，
以致於無法掌握它們真正的意義……

然而所有關於因果關係的問題，
像是科技與社會之間，都是極為實際的。
直到我們開始認真回答這些問題，才會真的知道，
我們談論的到底是科技還是科技的運用，
是必要的制度還是特定和可變動的制度，是內容還是形式。
而這也不只是知識不確定性的問題，而是社會實踐的問題。

雷蒙·威廉斯
《電視：科技與文化形式》

前言

本書代表了媒體人類學這個新興領域中已完成的諸多精彩研究工作。雖然我們力求周延，但勢必無法囊括此領域所有好的成果，特別是年輕學者的成果以及探討相關主題，如網路與新媒體、攝影、新聞和音樂方面的研究。儘管我們在導言中討論了許多經典研究，這些研究為我們的努力奠定基礎，但由於我們的意圖在強調當前的研究，因而也無法收錄它們。任何疏漏皆肇因於篇幅的限制。我們深知，此領域發展快速，期待將來能見到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也能付梓。 xiii

身為本書的編者，首先我們最要感謝的是本書的撰稿人，感謝他們創新的想法和研究；其次則歸功於編者彼此的通力合作。雖然我們最初的研究路線各有不同（容後再述），但卻在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共同參與了本書所源自的一項大型計畫「文化與媒體研究學程」（the Graduate Program in Culture and Media），這是一個專門為人類學、電影研究，以及跨領域的「媒體、文化與歷史中心」的學生所開設的學程。紐約大學的這項重點研究提供我們豐沛的研究生與同仁（他們的作品也呈現在本書中），他們激勵我們，讓我們的想法成形，並使我們深信這確實是一個可能改變人類學與媒體研究的重要主題。

莉拉·阿布－盧格霍德（Lila Abu-Lughod）對媒體的興趣始於八〇年代，當時她正與貝都因阿拉德阿里族（Awlad ‘Ali Bedouin）在埃及進行田野工作，察覺當地的流行歌曲文化正走向商業化，世代衝突出現在國族的媒體形式，如廣播肥皂劇中。這些現象激起她對自己早先的研究傾向的不滿，人類學傳統上所呈現的他者社會並非「現代性」（modernity）的一部分，文化也被視為封閉的。她於是想要進一步思考跨越社區的國族文化，並受到阿榮·阿帕杜瑞（Arjun Appadurai）與凱蘿·布瑞肯瑞基（Carol Breckenridge）所正開始進行的跨國文化研究的啟發，跨國文化研究隨後發展出《大眾文化》（*Public Culture*）期刊。她對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文化政治的研究焦點，特別在她與提姆·米契（Tim Mitchell）於九〇年代進行的「現代性 xiv

問題」(Questions of Modernity)的計畫中獲得發展，這項計畫匯集了來自中東與南亞的學者，也讓她學到不少後殖民研究。然而她對媒體理論與議題的認識，直接來自紐約大學人類學系師生，尤其是文化與媒體學程的師生，提供了豐富的知性激勵。她受惠於菲·金斯伯格(Faye D. Ginsburg)甚深，深深影響她對媒體及我們的社會與政治環境其他面向的思考。紐約大學對媒體有興趣的機構甚多，散布於學校各部門。對阿布－盧格霍德而言，最有關係的是由艾拉·舒哈特(Ella Shohat)、席瓦·巴拉基(Shiva Balaghi)、山費克(Viola Shafik)、阿姆布拉斯特(Walter Armbrust)等人協助，科佛基恩近東研究中心(the Kevorkian Center for Near Eastern Studies)策劃的影展；及對南亞有興趣的師生們，包括提嘉思維妮·甘提(Tejaswini Ganti)和阿奴帕瑪·拉烏(Anupama Rao)。最後，如同任何老師一般，她藉由紐約大學傑出的研究生所撰寫的研究計畫與論文，以及所開設的「文化與國族」(Culture and the Nation)、「現代性理論」(Theories of Modernity)等課程中，與研究生討論書籍與觀念的過程，受益良多。感謝他們所有人，特別是甘提、夏琳·漢蒂(Sherine Hamdy)、艾伊斯·帕拉(Ayse Parla)、伊莉莎白·史密斯(Elizabeth Smith)和潔西卡·溫格(Jessica Winegar)。直接對她的埃及電視研究有貢獻者更是繁多，將在本書她所撰寫的篇章結尾與其他發表刊物中分別致謝。

金斯伯格在媒體民族誌的研究成果是源自下述經歷：她長期對社會運動，以及對媒體在社會運動中扮演的角色的興趣；她在視覺人類學的背景——啓發並師承於尚·胡許(Jean Rouch)及其分享人類學(anthropologie Partagée)的理論與實踐；以及她持續不斷與同行間的對話，包括依蓮·查諾夫(Elaine Charnov)、尚·保羅·柯林(Jean Paul Colleyn)、傑夫·辛培拉(Jeff Himpele)、大衛與茱蒂斯·馬杜格(David and Judith MacDougall)、喬治·馬可斯(George Marcus)、霍華·莫菲(Howard Morphy)、哈洛德·普林斯(Harald Prins)、傑·魯比(Jay Ruby)、露西恩·泰勒(Lucien Taylor)、泰倫斯·特納(Terry Turner)、伊莉莎白·韋德佛(Elizabeth Weatherford)。當1986年紐約大學已故的安妮特·威納(Annette Weiner，當時是人類學系主任)與布萊恩·溫斯頓(Brian Winston，前任電影研究系主任)邀請她創立一個視覺人類學的學程(後來變成紐約大學的文化與媒體研究學程)，她於是決定回應那些對該領域的批判，而發展出一個學程，

在其課程中包含媒體是如何被傳統上成為民族誌再現的研究客體的那些社群所運用。她的研究提供了一個令人振奮的途徑，重新思考有關接收、反身性、和再現的政治與詩學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對視覺人類學來說一向相當重要。同時，原住民媒體開啓對媒體角色的思考，思考媒體作為在認同性社會運動中的文化社運裡的一個面向，其角色是什麼？而這也成為她過去十年來在研究與學程建制上主要的關注目標。她從該領域其他人身上學到甚多，他們當中一些人也曾在她擔任「媒體、文化與歷史中心」主任時至該中心參訪；她與紐約大學同事們的討論更是獲益良多：要感謝弗萊德·梅耶斯（Fred Myers），沒有他，這些成就都是不可能達成的，還有芭芭拉·安博許（Barbara Abrash）、曼席亞·賈化樂（Manthia Diawara）、史蒂夫·費爾德（Steve Feld）、梅格·麥克拉根（Meg McLagan）、托比·米勒（Toby Miller）、羅勃·史坦（Bob Stam）與喬治·史東尼（George Stoney）。她發現與阿布－盧格霍德和拉金共事是件令人振奮的事，兩人分別提供不同的角度讓本書形塑成現在這個樣子。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感謝對象，是不斷提供知性激勵的紐約大學「文化與媒體研究學程」歷任的學生們，特別是湯姆·畢卡勒（Tom Bikales）、甘提、艾莉森·葛里菲斯（Alison Griffiths）、亞歷山卓·朱哈茲（Alexandra Juhasz）、布萊恩·拉金（Brian Larkin）、傑瑞·隆巴迪（Jerry Lombardi）、莫琳·馬宏（Maureen Mahon）、艾瑞卡·沃森（Erica Wortham）、佩姬·薇爾（Pegi Vail）與克莉斯汀·威納（Kirsten Wehner）。他們時時提醒這份工作為何重要。

拉金在進入媒體民族誌之前的背景是英國的文化研究。他在奈及利亞對媒體和流行文化的研究，引領他檢視在殖民與後殖民現代性的發展下電影的角色。這方面的研究後來導向不同的方向：從研究當地觀眾所觀賞的另類世界電影，轉而分析電影院周圍所產生的社會空間作為殖民都市化演變的一部分。他以有關早期電影、非洲流行文化與媒體理論的研究為基礎，開始檢視媒體科技的物質性，以及科技（在殖民主義和後殖民國家的環境中）學門本身的力量與科技在地文化邏輯所造成的非預期性的運作方式，兩者間的辨證。他對媒體以及印度電影和非洲的見解，都是經過與其他學者的對話和大量知性的交流併發出來，因此很難說這些想法是源自於何處。尤其是梅格·麥克拉根經常引發他探索政治、宗教等其他社會領域是如何親密地搭上媒體大量曝光這條線的；甘提、葛里菲斯、瓊·海尼斯（Jon Haynes）與貝吉

特·梅耶 (Birgit Meyer) 在印度電影、早期電影和奈及利亞及迦納的錄像電影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無止盡的對話。身為紐約大學的學生，拉金得益於貝德曼 (T. O. Beidelman)、金斯伯格、阿布－盧格霍德、馬宏和沃森的指導與見解甚多。他在奈及利亞的研究，受到魯迪·哥迪歐 (Rudi Gaudio)、阿布度拉·馬哈迪 (Abdullahi Mahadi) (與阿瑞瓦之家歷史檔案中心，Arewa House Centre for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康納利·卡森 (Conerly Casey) 和歐瓦魯·漢莎 (Auwalu Hamza) (與卡諾省歷史與文化局，Kano State History and Culture Bureau)、菲利·席亞 (Phil Shea)、艾蓮·哈特森 (Alaine Hutson)、法拉瑪·帕瑪 (Haj. Fatimah Palmer) 及西恩·史提威爾 (Sean Stilwell) 在見解、激勵與支持等方面，獲得相當的增益。

xvi

我們要特別感謝艾莉西亞·葛維茲 (Alyshia Galvez)，感謝她為本書美術部分所做的傑出工作，還有薇爾，及莉莎·史黛芬諾夫 (Lisa Stefanoff) 和狄米特瑞·杜卡絲 (Dimitra Doukas) 為最後的手稿提供專業協助。我們十分感激加州大學出版社的編輯納歐米·史耐德 (Naomi Schneider) 與蘇·海涅曼 (Sue Heinemann) 及助理艾萊·希克森 (Ellei Hickerson) 與克里斯提納·凱特 (Kristina Kite) 的協助與熱忱；傑·魯比、露西恩·泰勒、丹尼爾·米勒、艾拉·舒哈特、羅勃·史坦與各個匿名的審稿人的珍貴意見。我們還要對首先鼓勵我們集結成冊的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的瑪莉·莫瑞兒 (Mary Murrell) 致謝。

我們在德國的同行，托比阿斯·溫鐸 (Tobias Wendl) 和漢克·貝瑞德 (Heike Behrend)，相當慷慨地讓我們使用他們劃時代的、有關非洲民眾的攝影集 (攝影展) *Snap Me One! Studiofotografen in Afrika* (Munich: Prestel, 1998) 中的數禎照片。我們要特別感謝迦納的攝影師菲力普·阿帕格雅 (Philip Apagya)，大方讓我們在封面用上他的作品；知名的澳洲既是漫畫家又是哲學家的麥克·林尼格 (Michael Leunig)，讓我們使用其慧黠的漫畫「消費者」；瑪麗·皮卡克 (Mary Peacock) 和朱利斯·貝克斯 (Jules Backus) 的遺產繼承者，讓我們使用「電視頭」；及普名達·賈卡伯 (Preminda Jacob) 拍攝坦米爾政治人物與電影名人的巨型看板照片。

最後，我們將持續不斷的感激獻給我們的伴侶：梅耶斯、米契和麥克拉根，感謝他們分享我們的研究，對我們的寫作提供建議，並犧牲他們的時間，讓我們全力完成本書；還要感謝我們的孩子，莎曼珊·梅耶斯

(Samantha Myers)、安卓亞與賈斯汀·米契(Adrian and Justine Mitchell)、辛妮與安妮·拉登(Sinéad and Annie Larkin)，是他們不斷提醒我們，在社會生活中想像力是多麼重要。

目錄

前言	i
導論	3
第一部 文化社會運動與少數族群的訴求	39
第 1 章 銀（螢）幕記憶： 在原住民媒體中為傳統重新賦予意義	41
第 2 章 視覺媒體與原始主義的困惑： 北美地區的殖民神話、原住民想像與政治主張	61
第 3 章 原住民錄像中的再現、政治與文化想像： 概要與卡雅波案例	79
第 4 章 差異的奇觀： 文化社會運動與西藏人透過大眾媒體發聲	95
第二部 民族國家的文化政治	117
第 5 章 埃及通俗劇——現代主體的技術？	119
第 6 章 史詩的競賽：印度的電視與宗教身分認同	139
第 7 章 國族的圖像：泰國媒體與文化身分	159
第 8 章 貝里斯的電視、時間與國族想像	177
第三部 跨國流通	195
第 9 章 上海的大眾媒體與跨國主體性： 紀錄一個中國大都會的（再度）國際化	197
第 10 章 心靈的馬歇爾計畫： 一齣哈薩克肥皂劇的政治經濟學	219

第 11 章	繪製苗族媒體在離散空間中的位置	239
第四部	製作的社會位址	257
第 12 章	美國公共電視紀錄片的定位	259
第 13 章	廣告世界中的文化：拉丁樣貌的生產	275
第 14 章	「但我心仍屬印度」： 孟買電影產業與好萊塢的印度（印地）化	291
第 15 章	抵達時的場面： 玻利維亞公共領域的共謀性與媒體民族誌	311
第五部	科技的社會生活	327
第 16 章	北奈及利亞電影院的物質性	329
第 17 章	移動式器材與流動的閱聽人： 從尚比亞的收音機文化再思考接收行為	345
第 18 章	機械複製時代的印度藝術作品： 或者，當農民「掌握」圖像時會發生什麼事？	363
第 19 章	活的還是死的？峇里島電視播映劇場之研究	379
第 20 章	空室魅音：泰國資訊世代的媒體發聲與通靈	393
作者簡介		407
譯者簡介		413
索引		415

Media Worlds

媒體世界

導論

菲·金斯伯格 (Faye D. Ginsburg)

莉拉·阿布—盧格霍德 (Lila Abu-Lughod)

布萊恩·拉金 (Brian Larkin)

本書所討論的關於「媒體在世界的位置」的問題並非新的問題。雷蒙·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等許多人早在25年前就已寫過了。但現在這些問題讓人感覺更加迫切，是因為媒體在當今世界各地已無所不在，這意味著我們人類學家在各種不同地區做研究都會碰到它。這種由經驗驅動的急迫感讓阿榮·阿帕杜瑞 (Arjun Appadurai) 在他1991年的一篇副標題為〈對跨國人類學的看法與疑問〉的文章中創生了「媒體景觀」(mediascapes) 這個概念；他刻意回顧較早期的人類學學門的自我定義，以便指出以下兩件事：大眾媒體已在20世紀晚期成為人們生活的中心，而與此現象同時並存的要求，就是人類學家應該去探討大眾媒體在分析上與實務上的意義。十年之後，本書(人類學家的論文集)的出版，意味著我們不再需要像黛博拉·史賓托尼克 (Debra Spitulnik) 於九〇年代初期在一篇全面性回顧的文章中那樣地感到遺憾；她在文章中悲嘆：「至今還沒有『大眾媒體的人類學』出現」(1993: 293)。我們現在已經認知到電影、電視、錄像和廣播在社會文化的重要性，它們幾乎是世界各個地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我們在研究這個現象時，帶入了獨特的理論關切和方法學。

一旦我們認知到在近來打算擺脫既定的空間和文化束縛的批判人類學研究中的媒體位置，便可以嘗試運用人類學將媒體研究推進新的領域，並檢視才剛開始被定位的不同媒體實踐。媒體接收發生的地點「不僅在客廳」，而媒體製作的地點也「不僅在攝影棚」；不只是因為它們發生於像亞馬遜雨林或是澳洲內陸這種地方，也是因為如同羅傑·希維史東 (Roger Silverstone) 對於如「觀看電視」這樣的行為所注意到的，這些行為的發生是「構成一整

這篇文章以金斯伯格的〈反擊：從民族誌電影到媒體民族誌〉(Shooting Back: From Ethnographic Film to the Ethnography of Media, 1999) 為基礎。其他對於媒體人類學文獻的全面性評論還有 Dickey 1998 和 Spitulnik 1993。

套每日實踐與論述行為的一部分；透過這套每日的實踐與論述行為，電視觀看這種複雜的行為本身才被建構起來」（1994: 133）。人類學對廣義的民族誌的投入，讓我們得以掌握媒體實踐運作其中的更廣闊的社會領域。因而，我們的研究共同受益於本身學門及所使用的鄰近學門在理論上的洞見和方法學上的複雜性，並使得這些理論與方法學往前推進。

媒體民族誌以許多不同方式擴展其「可以研究的對象」。舉例來說，人類學家追蹤社會中「追隨某個東西」的那些人物（Marcus 1995）——那個東西可能是一齣電影或電視連續劇——探討這個過程如何從菁英導演轉移到消費者（Abu-Lughod 1995, 1997; Dickey 1993; Mankekar 1993a, 1993b; Skuse 1999）；或是在不同地點流通的一個物品，像卡式錄音機（Manuel 1993）、一台收音機（本書的 Spitulnik）、甚至是收音機的聲音（Tacchi 1998）。這些策略讓我們不僅看到媒體是如何深植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也看到消費者和生產者本身如何被層層包圍於像論述世界、政治處境、經濟環境、國家情境、歷史時刻與跨國流動等等的相關脈絡中。

身為人類學家，我們以「全球」的角度來看媒體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跨文化研究是我們研究的基礎；事實上，有些人將電影研究的文本傳統加以擴展，以呈現所謂的「一部影片的人類學」（a film's anthropology, Caton 1999; Fischer 1995）。這種另類的路線是我們在工作中經常會遇到的——在非西方地區，媒體的呈現是以非法有線電視網的風行、或大量盜版錄像帶的方式出現——卻很少被計入美國或全球媒體產業的統計數字而成為解釋跨國媒體的基礎。事實上，這正是我們的論點之一，那就是西方所建構的媒體理論，除了極少數例外（例如，Sinclair, Jacka and Cunningham 1996; Sreberny-Mohammadi and Mohammadi, 1994）之外，已經建立一套媒體理論的文化框格（cultural grid），只讓特定種類的媒體科技和實踐能被看見。這些疏漏現在已被媒體與電影研究內部與學門以外的研究所探討，本書的論文即是希望為世界各地媒體的多元性重整版圖。

人類學家總是穩穩地根植於在地，但我們認知到在過去數十年中，某些科技和體制改變的狂潮已經產生無法逆轉的結果。舉例來說，電視傳播和20世紀國家的建立有著強大的歷史連結，而這樣的連結必須依賴資本密集的太空科技，相當容易便遭國家利益所掌控。然而，衛星和網路科技已經開啓其他種類的空間，讓跨越文化和地理政治的邊界變得更加容易，增加

媒體所有權的私有化並創造了新的市場。它們也促進新的社會形態（social configuration），這是透過階級區分或是離散關係所決定的媒體使用權而發生的。新科技也讓托比·米勒（Toby Miller）所謂的「文化勞工的新型國際分工」——將媒體勞工出口到第三世界——更加惡化，並伴隨著「對電學空間的敏感轉變為對電子學空間的不敏感」（1988: 377）。這些科技助長私有化媒體王國的形成（Schiller 1969, 1991），同時，對於錄像文化和其他去中心化的「小型媒體」形式的研究顯示，一個在經濟和社會組織上更為破碎、多樣的「新媒體時代」的出現（Larkin 2000），跟較老舊的大眾媒體形式相比，在新自由主義和晚期資本主義的流動之下，新媒體的非正式市場擴張更加有特色。在這些轉變中的政治和文化框架內，將媒體定位為一種社會實踐，讓我們得以說出我們和許多媒體研究的同僚共同的更大關懷——媒體如何讓以下幾點得以實行或被挑戰：權力的運作和社會運動的潛力、不平等的強化和想像力的來源、科技對於個體和集體身分認同的影響。

人類學家與媒體

多年來，大眾媒體被人類學認為是一個幾乎是禁忌的主題。對於一個認同傳統、非西方特性和在地活力的領域而言，大眾媒體令人想起西方的現代性。結果，人類學家對於媒體的研究要比其他領域的同儕來得晚些。雖然在1940年代出現了一些把劇情片和宣導片當成文化紀錄的零星研究（Mead and Metraux 1953; Bateson 1943），1950年代出現對於好萊塢電影圈的社會關係的研究，以及大眾媒體在非洲的影響（Powdermaker 1950, 1967），還有1960年代對於納瓦荷族人（Navajo）拍攝電影的研究（Worth, Adair, and Chalfen [1972]1997）——即索爾·沃斯（Sol Worth）所謂的「視覺傳播的人類學」（the anthropology of visual communication）（1980）——但一直要到1980年代晚期，人類學家才開始將媒體視為一種社會實踐而有系統地關注。

媒體人類學出現在一個特定的歷史和理論關頭：1980、1990年代人類學理論和方法學的分裂，以及一種「現在的人類學」的發展（Fox 1991），它是對過去半世紀以來的改變進行研究分析，而媒體在其中扮演著愈趨重要的角色。人類學除了對於在北美洲和歐洲進行人類學研究的接受程度愈來愈高外，它並且更加注意城市和鄉村之間，以及「第一」和「第三」世界之間在